

# 现在是外汇储备买资源的好时机

【财经纵横之叶檀专栏】

中资金融机构抄底国外金融机构应该慎行。有学者认为,目前中资金融机构的浮亏不是到期价值——中投损失浮亏三分之二以上,国家开发银行30亿美元注资巴克莱银行蒸发一半以上——以浮亏论投资输赢不可取,从战略上说,中国资金入股国外金融机构符合国家战略。

这种说法站不住脚。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中资金融机构的金融机构股权投资、外汇交易浮亏纷纷曝光,这不是一时得失,能从总体上说明中资金融机构在交易中的市场感觉与国际同行还差得很远。中投投资黑石,正是全球金融危机大爆发的前夜,而招行收购永隆,对于永隆的市场占有率评估过高,所有这些,都有违市场的公平、风险回避原则。而我国出海的投资机构全都铩羽而归,如果制度性、市场性软肋不根除,我国金融机构就会陷于屡投屡亏的境地。我国目前面临的发展阶

段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必须以实体经济立国,我国经济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市场经济的转型,是实体经济的转型,从制造业的低端跃上中高端。不同国家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各不相同,美、英是金融创新大国,德国、日本都是先进制造国,我们不能被忽悠得认为中国在现阶段必须成为金融衍生品大国。

金融大国,不一定是金融衍生品大国。请问问企业家们,他们需要的究竟是什么?他们需要的并不是花里胡哨的金融衍生品,而是高效率的、与各类企业规模匹配的、市场化的金融机构,这样企业才能得其门而入。如果说创新,这方面的创新才是最重要的、符合市场所需的创新。而美国的那些资产证券化产品,对于我国的企业与投资者基本属于废物,除了盘剥之外很少起到实体经济的固本作用。

在资本市场方面,我们需要新股发行体制的创新,需要解决非流通股遗留问题,需要

保障投资者公平投资机会的创新;在银行业,我们需要银行内部治理结构的创新,需要民间金融机构合法与监管的创新,需要在小额信贷领域的创新,需要培育市场不同投资、信贷群体的创新。

在基础条件均不具备之时,盲目地发展金融产品,我们将在不公平的基础上收获恶之花。在这方面,股改认股权证给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同时,我们也会忘记本土市场最迫切的需求,被天书式的金融衍生品说明书晃花了眼,而奉上真金白银。如果国外金融机构想进入中国市场,可以,请遵循中国市场需求与中国市场的运行规则,中国金融业必须创立一套契合本土企业与本土有效监管所需的标准与准则。

我国19000亿的外汇储备中可以动用的资金不过三四千亿美元,这些美元有远比投资国外金融机构更大的作用。金融机构挤泡沫之时,实体经济与资源等硬通货价格遭池鱼之殃,我国是个资源贫乏的国家,缺乏包括石油、铁矿石、

黄金在内几乎所有的资源战略储备与商业储备。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挫,石油期货价格腰斩,从每桶150美元下挫至28日的每桶55美元,铁矿石现货价甚至低于长期合同价格。在市场日益向买方市场倾斜的情况下,正是动用外汇储备购买资源的大好时机,也是理顺价格谈判机制,夺回定价权的关键时刻。

据报道,我国近期将与俄罗斯签署石油供应协议,根据协议,中国将向俄罗斯提供200亿到250亿美元的贷款,中国则可以在未来20年中获得来自俄罗斯的3亿吨原油。如果协议达成,这将是中国经济的好消息。

我们不缺乏金融衍生品,因为在中国发展的现阶段,并不需要也无法消化过多的金融衍生品,我们缺乏资源类产品,因为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亟需稳定的原材料供应保障。以此来看,我国的外汇储备应当用在何处,不是一目了然吗?

(作者系资深财经评论员)

# 三聚氰胺残留标准不能成谜

■热点纵论

如果没有之前影响如此巨大的毒奶粉事件,刚刚冒出来的“三聚氰胺超标鸡蛋”想必不会引起这么大的恐慌,很简单,因为我们还没有恐惧的标准。

“香港查出三聚氰胺超标鸡蛋”一事有了最新进展,10月28日的《信息时报》报道说,受香港“佳之选”品牌鸡蛋被查出三聚氰胺超标的影响,同样产自大连韩佳集团的“咯咯哒”品牌鸡蛋也在内地部分城市开始下架。至于“咯咯哒”品牌鸡蛋是否同样存在问题,“佳之选”品牌鸡蛋何以会出现三聚氰胺超标,这些都有待相关部门的进一步检验,但现在专家比较一致的推测是:饲料中三聚氰胺残留量超标导致了此次“三聚氰胺超标鸡蛋”事件,如果真是饲料出了问题,那受影响的将不仅局限于鸡蛋,各种鸡肉制品也无法幸免。

事情总会慢慢查清,这是没有悬念的,只是时间长短问题。我更关心的是农业部有关人士针对此事的一个表态——农业部将会同其他部门进一步修订饲料的三聚氰胺含量标准。

围绕这个标准,这两天还有好几个相关的表态。大连韩佳集团的声明中指出:目前三聚氰胺在饲料中的残留还没有行业标准。另有业内人士指出:目前国内鸡蛋主要检测大肠杆菌和农药残留两方面,没有针对三聚氰

胺的检测,新的检测标准很快将出台。农业部畜牧业司司长王智才接受记者采访时却表示,三聚氰胺是违禁品,不允许往饲料里添加。

这么多围绕饲料中三聚氰胺含量的表态,让人很困惑,也很恼火——如果三聚氰胺是不允许往饲料里添加的违禁品,为什么既有检测标准没有关于三聚氰胺的检测项目?农业部将会同其他部门进一步修订饲料的三聚氰胺含量标准,又从何说起?一个简简单单的饲料中三聚氰胺残留量标准,何以会搞得这么复杂?这些紧迫的疑问,迫切需要农业部联合相关部门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进行释疑,到底是违禁品还是残留标准不明?赶紧要让消费者和企业心里有个底。

“蛆桶事件”刚刚出来的时候,或许没有人会想到会造成如今农业部口中的“消费恐慌”,但现实永远比想象残酷,几天前不起眼的“蛆桶事件”,由于相关部门应对不力、重视不够,如今已经给柑橘产业造成了沉重打击,现在,“蛆桶事件”尚未过去,“三聚氰胺超标鸡蛋”又冒了出来,各地纷纷下架有嫌疑的“咯咯哒”品牌鸡蛋,众多网民感叹“鸡蛋都不敢吃了”,这些都是危机来临的信号。在食品屡屡出事的背景下,消除这场危机或许需要时间,但至少,先把饲料中三聚氰胺残留量标准搞清楚,别再让大家猜哑谜,好不好?

(陈强)

# 教育官员何以降至小学标准?

【中国观察之椿桦专栏】

领导干部们是要经常参加学习的,如何才能使官员们真正把参加教育培训当成“加油站”呢?河南省委出台了新措施。据《河南日报》10月28日报道,河南省委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要求干部在学习培训期间原则上不得请假,不准带秘书陪读,不准请人代为听课,不准请人代写学习记录和论文,不准抄袭他人学习研究成果。

上述要求的确有点新意,它新就新在:这些原本是用以教育小朋友的规定,现在却被用来教育官员了。如果我们的记忆力没有故障,就会记得读小学时,老师也曾苦口婆心地对我们讲过这些道理。励精图治的齐桓公,七八十岁还坚持学习,并因此说出了“活到老学到老”的传世名言。但如今,在公务员队伍中还有部分人

却是“活到老学到小”了。

“禁带秘书陪读”“禁止抄袭他人学习成果”之类的规定,其潜台词无疑是官员“带秘书陪读”等现象一度比较盛行——现实中,这类新闻也的确没多少人拿它当回事了。假如在学生群体中出现陪读、请人代为作文、抄袭等现象,那一定会成为很严重的事——成绩作废,扣发毕业证,取消升学录取资格……但规则约束对一些官员往往要比对学生们宽容得多,这势必会导致那些官员们严谨对待学习的动力逐步减弱甚至丧失。

当然,说一些官员对学习完全不感兴趣也不大现实,譬如,对学历课程班与风景区的培训活动,官员们大多乐此不疲。而学历考试及办公楼里的学习任务,就落在了秘书的肩上。秘书的存在,因而成了官员们惰于学习的一大阻碍。在

河南的新规中,参训干部必须住学员宿舍、吃学员食堂、过普通学员生活;学习期间,不准组织旅游、不准到营业性娱乐场所进行活动等。看来,这样的培训活动真的是用来培训的。而禁带秘书,禁止请人代写论文,禁止抄袭,这些虽然都是正确的废话,但对部分不学无术的官员来说,的确是高要求。

这样看,河南的规定虽略显荒诞,但不得不说,那都是对症下药之策。但这些药,能否发挥很好的疗效呢?我看够玄。想想看,禁止官员带秘书代其学习,这一规定在如今的信息时代,能发挥多大作用?秘书通过网络代写文章,有障碍吗?更何况,有些规定还只是“原则上”。至于对违规者的惩罚,如同上级对官员们的教育要求一样,是宽容而低水平的——只是将官员们的学习表现记录在

案,作为干部考核依据之一。但正如你所知,官员们的学习“表现”历来都很端正。

对官员道德的要求尺度一再下降,归根到底还是纪律对官员们的约束力也在下降,对秘书包揽官员大部分工作与学习的处理,缺乏力度。中央规定,只有副省级以上官员才可以配专门的秘书,但现实中,很多乡镇领导都可以享受如此待遇。中央党校副教授肖立辉曾说:现在,“有些领导干部离开了秘书,什么也干不了,干不好”。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恶性循环的状态:官员学习离不开秘书,秘书的精简就会很困难,官员们的学习与工作能力也就越难以提高。这时候,上级是继续降低要求来迁就这些官员呢,还是相反?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有时事评论集《舆论尖刀》问世)

# 黄兆峦案别为流言留下缺口

■热点纵论

廉江政协副主席黄兆峦被刺一案的三名疑犯落网后,警方通报称,此案是报复性伤害致死,是“个人恩怨”非雇凶杀人。但在“碧海银沙”“廉江在线”等网站上流传着各种猜测,不少网友表示,黄兆峦生前与女学生发生关系,遭该女生的男友报复。(10月28日《新快报》)

这几乎是必然的事。当地警方一方面宣布政协副主席被杀案成功告破,并且接受了有关方面15万元的奖励,一方面却对导致黄兆峦被报复的“个人恩怨”讳莫如深,不肯透露半点细节。既然选择了信息披露,就没有必要吞吞吐吐。警方对案件信息披露不全,恰恰为流言创造了生成的动力和缺口。既然是报复伤害致死,那么人们需要知道受害者何以招致报复,毕竟遇刺的是个政协副主席。

阻止流言非常简单,完全的信息披露足以剥夺任何流言生存的空间。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是近年来无数教训反推出的

公式,最近哈尔滨警察命案引发轩然大波就说明了这样的道理。

目前网上关于黄兆峦案件“个人恩怨”的猜测,到底有多少真实的成分,是流言还是谣言,抑或如受害人弟弟所言,是对方释放的信息烟雾,我们无从判断。但宣告案件水落石出并已拿到奖励的警方,显然不能持同样的态度。他们应当知道“个人恩怨”的内涵直至细节,不予披露的理由或许在于为官者讳、为死者讳,或许在于尚有进一步核实的必要。但不管如何,警方应当向对社会敞开一个信息的缺口。至少,他们可以对暂不披露作出一个合理解释。

信息有缺口,流言来弥补。公开真相是减少震荡与猜疑的良策,这样一条原则正在被哈尔滨事件的走向所验证。廉江政协副主席被杀案当然有它截然不同的特点,但在信息公开、真相披露的问题上并不能成为例外。没有滞后不加保留地公开真相,这是处理一切公共事件理应遵循的原则。(周东飞)

# 腐败是房地产业的一颗毒瘤

■公民发言

去年以来,重庆先后有8名厅级干部因收受巨额贿赂、为房地产开发商谋利而落马,有的已被判刑,有的陆续站上法庭被告席。“新华视点”记者指出,在权力缺乏监管的情况下,一些干部不是执政为民,而是为房地产“老板”执政。(《广州日报》10月28日)

发生在重庆的系列窝案,暴露出房地产业“行业性腐败”的基本特征:一方面,权钱交易贯穿于房地产开发的全过程,征地拆迁、土地出让、调整

用地性质、规划审批、调整容积率等环节都充斥着官商勾结,房地产的产业链有多长,权钱交易的“食物链”就有多长;另一方面,开发商行贿的普遍性让人吃惊,重庆一些“房地产50强企业”也卷入其中。

一些城市的房价为何高得让人望楼兴叹?因为开发商的利润畸高,因为盖房子的成本畸高。这个成本就包括“腐败成本”。“腐败成本”是笔糊涂账,也是个无底洞,此前有业内人士爆料称,房地产开发商的“灰色开销”占其成本总支出的约40%!所谓“爆料”本

不足信,可面对重庆的这一系列“窝案”,我们不得不信!

谁在为房地产业的“腐败成本”埋单?购房者。“腐败成本”越高,房价就越高,多一个贪官就会多一个家庭买不起房。从一定意义上讲,眼下房地产业陷入萧条,人们捂紧钱包持币观望,既是对楼市泡沫的无声反击,也是对房地产腐败的无声控诉。

政府出手救楼市,并不是救高房价,只有开发商降价自救,才能提振市场信心,吸引人们购房,拯救房地产市场于将倾——这是人们达成的一个共

识。另一个共识则是,泡沫破裂、危机四伏,正是我国房地产业浴火重生的一个机遇。如何健康发展包括很多命题,但剔除腐败无疑很重要。腐败不除,“腐败成本”难消,房价便不可能回归理性;腐败不除,违法操作难消,房地产业便不可能真正市场化;腐败不除,危机难消,房地产业便不可能让人们充满信心……从这个角度看,政府救市不应仅仅局限在施惠于开发商,让利于购房者,还应拿腐败开刀,斩断权钱交易的“食物链”,剔除“腐败成本”,让房价自然而降。(晏庆盛)

# 吸毒局长何以能隐藏至今?

■公民发言

河北一地税局长刘某平时嗜好吸冰毒,甚至到北京体检时也不忘随身带一包,当他在酒店与小妞分享吞云吐雾的感觉时,被民警当场抓获。(10月28日《京华时报》)

有人吸毒,算不了什么新闻。可一个税务局长怎么就让人吃惊了。这究竟怎么回事?去北京体检时也不忘随身带包冰毒,至少说明他毒瘾不轻,吸毒时间已经不短了。报道说,体检结束后,他在一家酒店开房住下,与他一起来北京的河北某公司老总提议,为他找小姐一起吸毒。就是说,他的吸毒史,局外人都已经很清楚了,而且他似乎也无所顾忌。这很让人纳闷:难道这位局长大人平时会伪装得十分深沉,没有任何人能察觉,尤其是没有被纪检部门的人察觉

吗?无论如何,我不相信。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税务局局长居然只有小学文化。我们虽然鄙视唯文凭论,可税务部门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让一个连义务教育都没完成的人来当局长吧。如今,在一个博士觉得公务员职位都不容易的时代,我不知道,这位小学毕业、吸毒上瘾的局长,怎么能领导知识化、专业化的税收队伍?

耐人寻味的是,许多问题官员的曝光,都是源于一些偶然因素。有巨额赃款是因为楼下漏水发现的,有非法盗猎事情败露是因为把入当野猪打死而浮出水面的……刘某之东窗事发,同样也未能免俗。当脓包已经溃烂,脓水已经流出,我们的一些监督部门往往才如梦方醒。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监督机构变成了聋子的耳朵?

(张兰英)

■相关评论

深圳楼市身陷困局或再降10%。虽然房价大幅下降,但购房者大多并不领情,观望阴霾笼罩的深圳楼市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局。开发商:不做广告等死,做广告找死。(10月28日《中国经济时报》)

我们经常歌颂市场的力量,而今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力量:消费者的不合作。从楼市的低迷,到牛奶无法售出,再到蛆相传言,消费者的不合作,使得经营者叹息声响起。消费者的不合作,使得市场失

# 敬畏消费者不合作的力量

去了动力,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状态,特别是政府救市的冲锋号已经吹响,而消费者依然在“散兵坑”里沉默。

这样的社会困境自有其根源,在一个被决定了的世界,消费者的弱势难以改变。康德的哲学告诉我们,人本身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但长期我们的评价机制,却有意无意地将消费者作为了手段,作为拉动GDP上涨的手段,这使得消费者长期处于为了目的而受损害的地位。

这样的损害,使得消费者失去了对于社会的信心,所以,当政府大力救市,需要消费者出手时,消费者却躲在“散兵坑”思考:是不是又要拿我们当手段了?这样的怀疑也就导致了消费的迟延。

其实在一个合作化的社会,我们每个人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为了达到自身目的,我们甘心成为社会的手段。但如果消费者作为目的的重要性总是被忽略,总是以一个工具的姿态出现,那么人们就会怀疑这个市场

的正义性,并选择沉默,当前消费者普遍的观望,就是这种社会困境的体现。

解决当前的观望困境,答案也就在消费者的有力上,政府所有的政策应该体现出信用的力量:让消费者感觉到自己是被重视的,是政府救市的根本目的所在,而不是单纯达成目标的手段。只有这样才能让消费者停止不合作,从而为了自身的目标,也积极配合政府应对当前全球化的危机。(邹云翔)